

基于可行能力的失地农民市民化测度 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陈 浩,葛亚赛

(江苏大学 管理学院,江苏 镇江 212013)



摘 要 从森的可行能力视角探讨了失地农民市民化发展的能力属性,进而构建包含多维可行能力的失地农民市民化测度体系及其影响因素的 SEM 模型;在此基础上,对苏南地区 482 户失地农民调查样本作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样本地区失地农民市民化程度总体处于偏低水平,其中经济能力和发展能力不足的瓶颈效应尤为突出;农民个体人力资本、征地补偿、社区扶持和公共服务等因素对提升失地农民市民化能力具有积极意义,而人力资本变量发挥了部分正向中介效应。

关键词 可行能力;失地农民;市民化测度;SEM 模型

中图分类号:F 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16)06-0017-09

DOI 编码:10.13300/j.cnki.hnwxzb.2016.06.003

失地农民是伴随我国农村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所形成的一类特殊农村群体,推动失地农民市民化转型是新型城镇化战略需关注的重要内容。但实地调查表明,即使在苏南等经济较发达地区,一些安置在城镇的失地农民在市民化认知上仍然存在显著差异,既有一部分受访者认可已成为“城里人”,但同时也存在另一些失地农民对市民化角色认知度偏低现象。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固然很多,但缺乏对失地农民市民化内涵及其衡量机制的深度把握可能是其中重要因素,使得当前无论是农民自身还是相关部门对市民化发展认识上存在着一定的模糊性或片面化。因此,从理论上厘清失地农民市民化发展的内在属性,从而探究失地农民市民化测度体系及其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失地农民市民化及其阻滞因素进行了大量研究。董金秋等基于社会学视角,提出了包含市民理性精神、市民职业性、市民生活方式、市民社会保障、市民社会参与性及市民政治自治性等六因子的失地农民市民性概念模型^[1];朱晒红基于政府公共性缺失的视角,探讨了造成失地农民市民化困境的三层制度障碍^[2];吴业苗的研究则表明,公共服务滞后是导致城郊被征地农民市民化困境的主要原因^[3];李永友等基于浙江省富阳等地实地调查发现个体体征和制度性因素延滞了失地农民市民化进程^[4];冀县卿等利用 469 户失地农民的调查数据发现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等相关资本不足是失地农民城市适应性较差的主要原因^[5];杨圆圆认为要提高征地过程的民主化程度来增强失地农民对政府市民化安置的情感支持^[6]。

上述文献从不同角度对失地农民市民化问题进行了分析,但总体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体现在:现有文献大多基于特定层面(如单纯经济或社会层面)进行考察,对市民化程度的测量也基本停留在单一维度指标,而失地农民市民化既是一种静态身份转换结果,更是一个系统转型发展过程,其必然涉及多方面复杂要因,需要引入多维度结构指标;此外,从长远角度看,衡量失地农民的市民化发展最终取决于其所拥有的融入城市的各种行动能力,因此,从能力视角考察将有利于深度把握失地农民市

收稿日期:2015-11-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户劳动供给决策与就业发展研究”(12CGL074);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长三角地区农户兼业行为及其彻底离农化对策研究”(10YJA790016);国家统计局统计科研项目“基于森的可行能力视角下失地农民市民化程度统计评价与对策研究”(2014LY071);江苏省“青蓝工程”人才项目以及校人文社科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陈 浩(1975-),男,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农村公共管理。

民化演进规律,但国内类似研究较少。

鉴于此,本文力图运用阿马蒂亚·森(下简称森)的可行能力理论^[7],研究基于可行能力视角的失地农民市民化程度衡量及其影响因素体系,进而构建结构方程模型(SEM)对苏南地区 482 个农户实地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影响失地农民市民化水平差异的因素变量及其路径关系,最后形成相关研究结论和建议。

一、理论分析

1. 森的可行能力理论

可行能力理论是 20 世纪 90 年代由福利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提出的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发展理论。森运用可行能力来评价特定个体的福利水平及其发展状况,所谓可行能力是指所有可能实现的多种功能性活动集合,而个人获取可行能力程度将取决于五种关键性的权力或自由状况,分别为:经济条件、政治自由、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与防护性保障^[7]。这些权利和机会能直接扩展人们的可行能力,帮助人们更自由地生活并提高人们的整体能力,同时它们也相互补充,相互强化。人们能够得到的发展成就既取决于经济机会、政治自由、公民权利、社会保障、基础教育以及社会对于各种权利所提供的制度性保障;同时,提供这种机会和选择制度的安排又取决于人们如何通过自由地参与社会选择和公共决策来建立。因此,可行能力的获取不仅构成了衡量个人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同时也是实现发展目标的核心保障。

2. 失地农民市民化的可行能力类型

失地农民市民化是指受城镇化征地行为推动,使得农民离开土地迁居城镇进而最终转变为城市居民的行为和过程。失地农民市民化发展不仅要求实现在身份上与城市居民同等地位,同时需实现从生产、生活方式到思想观念等多方面由农民向市民的深度角色转型。因此除了需要诸如户籍等外部制度保障之外,更重要的是应具备融入城镇发展的种种可行能力,其中后者对实现市民化具有内生作用。基于森的范式,构筑如图 1 的分析框架,可见,失地农民市民化可行能力大致包括 5 层次类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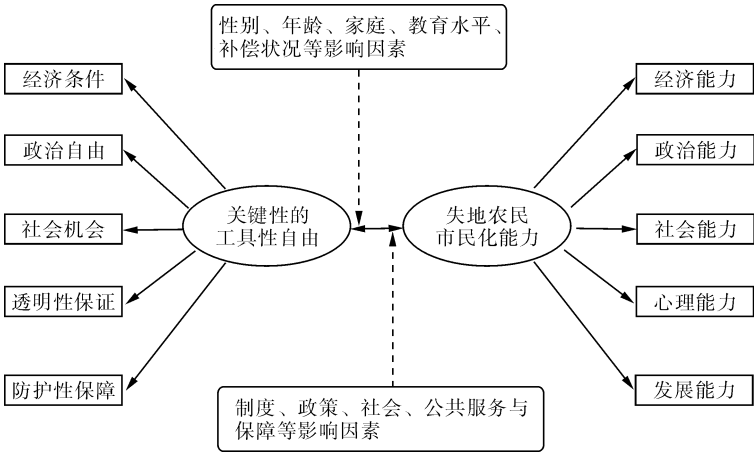


图 1 可行能力视角的失地农民市民化分析框架

- (1)经济能力,是指农民在城镇面临的消费、生产、交换等经济行为的能力状况,具体可包括工资收入、财产性收入、消费支出和生活水平等,其中由就业决定的工资收入最为关键。失地农民进入城市后,如果就业得不到保障,将导致长期收入水平降低,自我保障能力削弱,从而难以适应城镇生活和消费水平,一旦手中有限的安置费消耗殆尽后,他们就有可能沦为新的城市贫民,从而丧失在城市长期生存的能力。因此,经济能力对失地农民市民化发展具有基础性意义。
- (2)政治能力,是指进城农民能否具备行使其合法权利的能力,包括获取区域政策信息、参与社区决策、有充分的利益表达渠道和权利伸张机制等。失地农民只有具备了必要的政治能力,才能确保增

强其维权及公共参与的意识与能力,为失地农民市民化转型提供重要政治权力保障。

(3)社会能力,涉及失地农民能否形成相应的社会化行动能力,具体可包括适应环境的工作模式和生活方式、人际交往以及参与各类社会行为等。社会能力是衡量农民适应与主动融入城市社会,获取在城市生活和发展所需社会资源的重要因素,构成了失地农民市民化的重要内容。

(4)心理能力,主要指失地农民对市民身份的心理认知,并在社会心理方面逐步建立起符合城市市民心理的特征。关注影响失地农民市民化程度的心理因素,不仅要注意到实际的感受,更要关注怎样的城市生活是失地农民向往的,以及他们珍视城市生活的理由。例如,工具性自由中的透明性保证(包括知情权、选择权等),有效体现了失地农民拆迁安置过程中希望公正、公开的诉求,直接提高了失地农民向城市居民转化的心理归属感。心理能力构成了失地农民市民化的深层次体现。

(5)发展能力,主要指农民在获取文化教育、就业培训、信贷支持等发展资源和实现自我追求的信心和能力。森指出,“一个人如果没有意识和能力抓住外部有利的发展机会,则他将遭受发展机会剥夺,进而会通过各种因素引致多种其他能力的剥夺,如收入的贫困,个人的发展将永远停滞。”^[7]因此,发展能力是衡量失地农民市民化发展的最高层次,是其他能力形成和持续发展的源泉。

3.失地农民市民化可行能力的影响因素

影响失地农民市民化能力的形成将受制于一系列因素,包括征地补偿、社区市民化扶持、公共服务以及人力资本等。

(1)征地补偿因素。对失地农民来说,拥有的最大财富是农村中的住房及土地等,这些提供了农民在农村生产生活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农户家庭获得稳定农业收入的基本来源,失地后,相应征地补偿是否能足额弥补农民的财产损失,将直接关系到他们能否具备适应城市生活和发展的能力。常见的征地补偿方案中包含补偿方式、补偿标准、配套保障以及有关促进失地农民就业或创业的政策安排。国内一些学者从征地规模、用途、征地安置补偿等不同层面,实证研究了征地政策因素对失地农民市民化发展的显著影响^[8-9]。此外,如果失地农民进入城镇利用征地补偿实施人力资本投资,推动非农就业发展,将构筑农户非农收入长期增长的机制,有利于提升失地农民市民化程度^[10]。由此提出假设1:

H₁:征地补偿因素对失地农民市民化能力具有正向路径作用。

(2)社区扶持因素。一方面,积极的社区经济扶持能够帮助失地农民更好地获得城镇发展所需的就业信息、经济资源、知识及发展机会,从而提升其市民化经济能力和发展能力;另一方面,失地农民进入城市社区后如果能得到必要的社会文化支持,将有益于获取社区政治资源、人际网络和文化价值观等,将有利于增强失地农民融入和适应城市的政治能力、社会能力,形成健康的发展预期和心理状态。由此得到假设2:

H₂:社区扶持因素对失地农民市民化能力具有正向路径影响。

(3)公共服务因素。失地农民市民化发展还依赖一些必要的基本公共服务资源,主要包括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生活设施、交通通讯以及文化娱乐等条件,这些公共服务资源有利于提升失地农民在城镇环境的长期生活和发展质量,因此,由政府所提供的面向失地农民的城镇公共服务资源及其配置公平性因素,对增强失地农民的市民化能力具有决定性意义。由此得到研究假设3:

H₃:公共服务因素对失地农民市民化能力具有正向路径影响。

(4)人力资本因素的正向中介效应。一方面,人力资本对农民市民化能力的形成具有正向影响。失地农民在离开传统村落进入城市后,能否在新的城市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将显著受其人力资本禀赋的制约。Shittu 研究认为,教育文化程度、技能培训等人力资本因素将直接影响失地农民在城镇能否获得非农就业机会、职业类型的选择^[11]。因此那些具备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失地农民,将更能顺利实现就业转型,相应市民化能力也越强。

另一方面,人力资本因素也发挥某种中介影响效应。首先,失地农民获取的补偿因素可以对失地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起到“推动”作用,征地补偿水平的提升有助于增强失地农民的接受就业培训的信心、提升创业以及就业能力,进而促进了人力资本发展。其次,公共服务因素也影响了进城农民在

城市就业的意愿,成为失地农民提升人力资本的“拉力”因素。公共服务发展越好的地区有利市民化的因素越多,拉力越大,失地农民转市民的意愿越强;有利因素越少,拉力越小,失地农民转市民的意愿越弱。此外,社区扶持及其扶持因素也对失地农民人力资本的发展具有正向影响。社区扶持力度越大,越有利于失地农民积累人力资本,从而提升获取较高收入、适应城市生活的能力,形成长期“心理累积效应”,为失地农民的市民化社会能力与心理能力的提高发挥积极作用,这对提升失地农户家庭长期市民化能力具有重要意义。由此提出假设 4:

H₄:人力资本因素对失地农民市民化程度具有正向中介路径影响。

综上,构建失地农民市民化能力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如图 2),以下将运用苏南地区 482 个失地农民调查数据对上述假说进行实证检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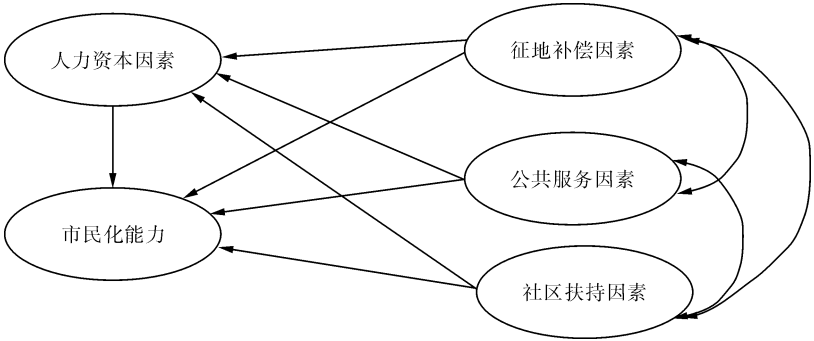


图 2 失地农民市民化能力及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

二、模型方法与数据来源

1.调查样本与数据来源

实证研究数据来源于作者主持的相关课题阶段性调研成果,调研时间为 2014 年 6 月—2014 年 9 月,以江苏苏南的常州市、镇江市作为样本地区,选取代表性的失地农民集中安置社区,分别为常州市嘉泽新苑小区、镇江市武将新居小区和平昌新区的失地农民进行入户问卷调查,共获得有效样本 482 份。

2.研究工具和量表开发

结构方程模型(SEM)是研究观测变量与潜在变量关系以及各个潜在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方法。结构方程模型一般可包括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前者进行潜在变量的开发和测量,后者反映潜在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根据上文理论分析,分别构建以市民化能力作为内生潜变量,以征地补偿、社区扶持、公共服务以及人力资本为外生潜变量的 SEM 模型,并初步开发了相应量表项目(如表 1)。

3.变量检验

(1)信度检验。对潜变量的各测量指标项目是否具有 consistency 或者是稳定性进行验证。运用 Cronbach’s α 系数来测度问卷各变量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一般而言,当 α 系数 >0.7 时,表明该量表可信度较高。本文使用 SPSS20.0 软件对各变量进行信度检验,结果见表 1,从总体看,所有变量量表的 Cronbach’s α 均 >0.7 ,表明问卷整体的可信度较高。

(2)效度检验。对测量指标是否能够准确度量潜变量程度的判断。运用 KMO 与 Bartlett 球形检验法对问卷变量测量项目进行效度检验,KMO 值大于 0.7 视为良好,在 0.6~0.7 之间可接受。表 1 中的各潜变量 KMO 值处于 0.630~0.836 之间,表明本文设定的潜变量测量模型通过收敛性验证。

三、样本地区失地农民市民化能力的测度分析

1.一阶验证性因子分析

按要求运用 AMOS20.0 软件,设置因果关系路径,模型拟合优度检验所示。其中部分指标不符

合拟合优度检验,说明模型需要修正。将固定参数作为自由参数进行重新估计后,修正模型检验与拟合结果见表 2。从表 2 中可见,相关检验值都满足要求,表明模型拟合度较好。

表 1 变量指标的信度与效度

变量		测量指标	KMO	Bartlett 检验	因子载荷	累计贡 献率/%	Cronbach'α
市民化能力	经济能力	A ₁ 工资收入	0.667	162.793 (0.000)	0.690	59.886	0.770
		A ₂ 财产性收入			0.722		
		A ₃ 消费支出			0.867		
		A ₄ 生活水平			0.804		
	政治能力	A ₅ 我对社区公共事件很关心	0.796	209.685 (0.000)	0.862	69.766	0.852
		A ₆ 我积极参加社选举投票			0.810		
		A ₇ 我积极向社区提出一些合理化建议			0.851		
		A ₈ 我喜欢观看央视《新闻联播》节目			0.816		
	社会能力	A ₉ 我有时间就参加健身娱乐活动	0.686	91.539 (0.000)	0.854	68.120	0.757
		A ₁₀ 现在与左邻右舍相处融洽			0.791		
		A ₁₁ 我积极参加社区公益组织			0.831		
	心理能力	A ₁₂ 我已经适应了城市的生活习惯	0.763	219.449 (0.000)	0.773	67.878	0.839
		A ₁₃ 我不怀念过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			0.721		
		A ₁₄ 我对放弃农地迁居城镇不后悔			0.900		
		A ₁₅ 我觉得我已经是城里人			0.887		
	发展能力	A ₁₆ 征地后我有了更好的工作机会	0.680	71.761 (0.000)	0.821	64.559	0.711
		A ₁₇ 我愿意接受创业培训			0.786		
		A ₁₈ 我觉得我的工作很有前途			0.803		
影响因素	人力资本	受教育程度	0.630	39.183 (0.000)	0.875	76.531	0.693
		就业技能			0.875		
	征地补偿	征地配套生活保障	0.785	432.337 (0.000)	0.942	80.633	0.919
		征地补偿方式			0.949		
		征地补偿标准			0.915		
		征地就业创业政策			0.775		
	社区扶持	社区文化活动	0.690	125.151 (0.000)	0.893	72.773	0.809
		社区志愿服务活动			0.830		
		遇困难找社区解决			0.835		
	公共服务	交通通讯条件	0.836	534.729 (0.000)	0.868	80.079	0.938

表 2 修正模型检验与拟合优度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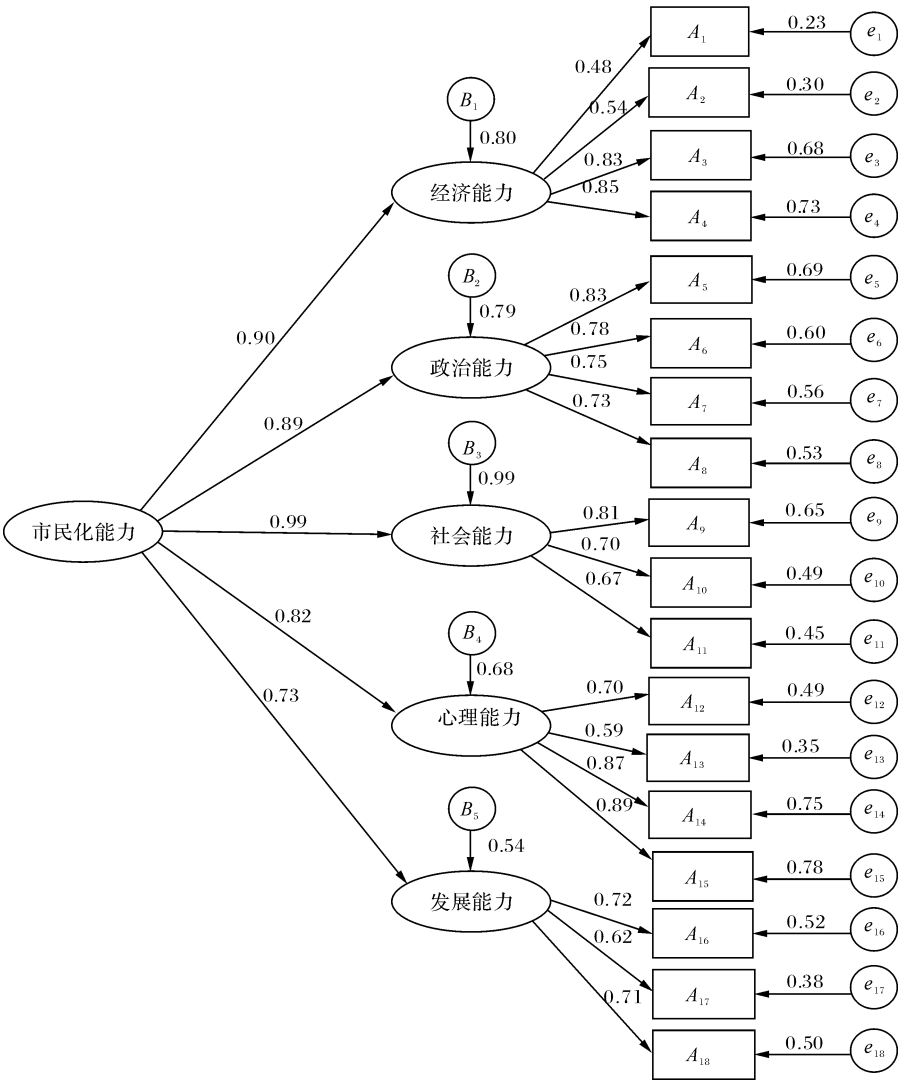
拟合指数	卡方值(自由度)	CFI	NFI	IFI	RMSEA	GFI	AGFI	RMR
结果	340.051(125)	0.937	0.863	0.939	0.076	0.860	0.793	0.089

依据本文的理论建构,18 个测量维度项目分别代表失地农民市民化五层能力,则 18 个测量数据(显变量)与 5 个维度(潜在因子)就构成了一个一阶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在最终修正模型结果的基础上,计算形成结构方程标准化路径系数值,通过考察相关变量系数,其中,政治能力和社会能力的相关度最高,达 0.93;经济能力和社会能力的相关度次之,达 0.83;而政治能力和发展能力之间的相关度则最低,为 0.55。所有的潜变量间的相关系数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这些因子之间多少是有关系的,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显著的相互促进作用。

2.二阶验证性因子分析

由前文分析可知,失地农民市民化能力变量非常复杂,它是一个多维能力的综合。从因子分析来看,这些市民能力的各个维度构成了一个多维的因子结构,那么这 5 个一阶潜在因子的背后是否真有

一个共同的因子——市民化能力的存在,这个问题可以用二阶验证性因子分析进行假设验证。图 3 为二阶验证性因子分析的参数估计结果,在该分析模型中,除了 18 个显变量与 5 个一阶潜变量之间的测量模型外,还包括一阶潜变量与二阶潜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构模型。



卡方=361.244,df=130,P=0.000,RMSEA=0.122,GFI=0.778,AGFI=0.709,NFI=0.748,RFI=0.704,IFI=0.823

图 3 失地农民市民化能力的二阶因子模型因果路径系数

从二阶模型拟合结果可以看出,构想的 5 个因子在更高市民性因子上的载荷为 0.73~1.00,发展能力的载荷为 0.73,是最小的,其余的都在 0.80 以上。综合结果表明二阶因子与一阶因子的关系也是较强的,5 个子因子可以构成市民化能力这个高阶因子的五个表征,其中,社会能力、经济能力、政治能力和心理能力在二阶因子上负荷系数较高(分别为 0.99、0.90、0.89、0.83),构成了这个因子的主要成分。

3.失地农民市民化能力的测度结果与分析

表 3 中的三级指标为失地农民市民化能力单项指数,由各测量项目分值计算获得;失地农民市民化能力各维度能力构成二级指标,由各潜在变量计算得出;而一级指标是失地农民市民化能力指数。每个单项指数赋值方式为 5 级分制,每项市民化能力单项指数值等于该项指数实际得分除以 5 后取均值,并转换为百分比形式,并假设各单项指数权重相同。失地农民市民化能力总指数则是对各维度能力权重计算的算术平均数。同理,市民化能力影响因素变量的赋值也是采取将潜在因素变量的各项测量值相加后的简单算术平均数。

表 3 结果表明,市民化能力总指数值为 46.714(总分为 100),显示了样本地区失地农民市民化程度总体处于偏低水平;而从各维度市民化能力的分值高低排序,依次为社会能力、政治能力、心理能力、发展能力、经济能力。其中,经济能力是评分最低的因子,其所涉及的单项指标“生活水平”(45.6)、“消费支出”(42.8)、“工资收入”(30.6)分别排在第 11、13、18 位。此外,发展能力因子中的单项指标“拥有更好的工作机会”(35.0)得分也偏低。心理能力因子中的单项指标“不怀念过去的生活方式”(45.4)的分偏低。政治能力因子中的单项指标“向社区提合理化建议”(42.4)得分偏低。社会能力因子中的单项指标“参加社区公益组织”(39.2)得分偏低。由此可见,样本地区失地农民市民化过程对经济能力十分敏感,期盼有好的工作机会,提高城镇化收入和消费水平;此外,一些农民心理上还未融入城市,在适应新环境的生活方式、参与各类社会组织活动和社区决策等诸多的能力也显著不足。

表 3 样本地区失地农民市民化能力测度结果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市民化能力指数	各维度能力指数	排序	单项指数	排序
46.714	经济能力 41.55	5	工资收入 30.6	18
			财产性收入 47.2	8
			消费支出 42.8	13
			生活水平 45.6	11
	政治能力 50.05	2	关心公共事件 51.0	5
			参加选举投票 49.6	7
			提合理化建议 42.4	14
			观看《新闻联播》 57.2	2
	社会能力 50.80	1	参加健身娱乐活动 53.6	4
			与邻居相处融洽 59.6	1
			参加社区公益组织 39.2	16
			适应了城市生活 56.4	3
	心理能力 48.70	3	不怀念过去生活方式 45.4	12
			对放弃农地迁居城镇不后悔 47.0	9
			现在已经是城里人 46.0	10
	发展能力 42.47	4	我有了更好的工作机会 35.0	17
			愿意接受就业创业培训 51.0	5
			我觉得我的工作很有前途 41.4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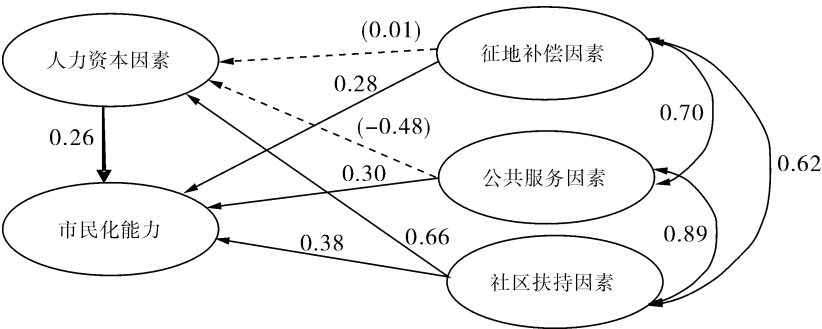
四、失地农民市民化能力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进一步运用 SEM 方法对失地农民市民化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通过检验并最终修正模型结果,形成如图 4 和表 4 的路径系数和影响效应值:

通过考察相关变量系数值,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1)影响失地农民市民化能力水平具有多层次因素共变特征,其中公共服务因素具有基础性作用。图 4 显示,征地补偿、公共服务、社区扶持因素之间均存在显著的两两正向相关关系。从相关系数看,公共服务的关联效应最强,其对征地补偿与社区扶持的相关系数分别达 0.70 与 0.89,这表明基本公共服务是影响其市民化的重要因素,必须充分关注有助于提升失地农民生活质量和发展的公共服务因素,对确保并扩展失地农民的市民化能力具有决定性意义。

(2)社区扶持因素对失地农民市民化能力的总影响系数值最大,达 0.55(分别为直接效应 0.38 和间



注：实线表示通过 5% 以上显著性水平检验，虚线为未通过检验。

图 4 失地农民市民化能力影响因素路径系数结果

表 4 修正后的影响效应值

影响路径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征地补偿因素→市民化能力	0.28	—	0.28
公共服务因素→市民化能力	0.30	—	0.30
社区扶持因素→市民化能力	0.38	0.17	0.55
人力资本因素→市民化能力	0.26	—	0.26

接效应 0.17^①),其次是公共服务因素、征地补偿因素和人力资本因素。社区扶持因素增加对失地农民市民化程度具有较为显著的直接效应,同时也通过促进人力资本因素的正向“中介效应”,构成了对失地农民市民化程度提升的间接效应,这验证了本文的假说 3 与假说 4。

(3)征地补偿因素和公共服务因素对失地农民市民化发展具有直接促进效应。模型显示,征地补偿变量和公共服务变量对失地农民市民化能力变量的回归系数数值均为正值,分别为 0.28 和 0.30,表明失地农民在获得相应充分足额征地利益补偿,以及享受与城镇居民均等化的基本教育、医疗卫生、基础生活设施、交通通讯以及文化娱乐等公共服务资源条件,将显著增强其市民化能力,这验证了假设 1 和假设 2。

(4)人力资本的中介效应部分成立。人力资本对市民化能力具有直接正向影响效应,系数值为 0.26,同时社会扶持措施也有利于失地农民人力资本积累,这表明社区扶持因素既可以直接影响市民化能力,也可以通过人力资本因素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市民化能力市场绩效,社区扶持力度越大,失地农民人力资本水平就越高,获取较高收入、适应城市生活的能力愈强,有利于形成长期的“心理累积效应”,为失地农民的市民化社会能力与心理能力的提高发挥积极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征地补偿和公共服务对人力资本的影响效应却不显著,由此使得人力资本的中介效应不完全成立。究其原因不尽相同,前者显示了现阶段样本区农民对征地补偿款支配方式存在一定的偏差,大多倾向于诸如一般生活消费或储蓄,而用于提升自身素质的教育和技能培训比例较少,这也验证了丁士军等学者的研究观点^[12];而后者则与当前一些地区在面向失地农民的公共服务供给上存在可及性不足和服务能力低下等因素有关,从而不能发挥持续提升失地农民内在素质的作用。考虑到失地农民市民化发展本质是人的能力提升,而人力资本是增强失地农民市民化能力发展的战略定位,因此,未来应推动基于人力资本导向型的征地补偿政策和公共服务体系改革,以促进失地农民市民化能力的持续内生性增长效应。

五、结论与建议

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心是推进人的城镇化,失地农民是城镇化需要关注的重要转型群体。因此,提升失地农民市民化程度既是保障这一群体平稳顺利实现城乡转型的重要一环,同时也构成衡量新

① 间接效应值为社区扶持因素对人力资本影响系数值 0.66 与人力资本对市民化能力影响系数值 0.26 之积。

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核心标志。然而,受长期的城乡二元分割体制及其固化效应影响,我国农民市民化发展进程存在一系列突出障碍和制约,既存在一些外部制度和环境条件的桎梏,如城乡二元分割体制、户籍制度等,需要深化改革;更重要的是,部分失地农民可能存在面向城镇环境下的自我生存和适应性等种种市民化能力的不足与障碍,而后者对推动失地农民市民化发展具有内生决定作用。

本文基于森的可行能力视角,构建了包含经济、政治、社会、心理和发展的“五位一体”可行能力的失地农民市民化水平测度体系及其影响因素 SEM 模型;并运用苏南地区 482 个失地农民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样本地区失地农民市民化总体处于偏低水平,各维度可行市民化能力得分普遍不高,尤以经济能力和发展能力值最低,构成了制约市民化发展的突出瓶颈;进一步研究表明,农民个体人力资本、征地补偿、社区扶持和公共服务等因素对提升失地农民市民化能力具有显著积极作用,而其中人力资本变量发挥了部分正向中介效应。

为此,提出如下建议:(1)要把构筑有效的可行市民化能力作为推动失地农民深度市民化发展的长效之策,注重培育失地农民的经济、政治、社会、心理和发展等多方面市民化能力,其中特别要重视增强其经济能力和发展能力,以形成对其他能力的支撑作用;(2)以人力资本投资促进失地农民可行市民化能力塑造。鼓励和引导失地农民利用征地补偿契机,积极提升自身健康、教育以及技能人力资本水平,实现有效的非农就业增长,从而提高其长期经济能力和发展能力,进一步提升失地农民市民化可行能力水平;(3)注重发挥城镇社区市民化行动的扶持作用。开展面向包括失地农民在内的新市民社区活动与专项帮扶,鼓励其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和公共活动,促进失地农民与城市居民的广泛交流,增强其融入适应城市工作和生活环境能力,形成正确的生活方式和心理价值观,进而增强其市民化政治、社会和心理能力;(4)保障失地农民享有均等化公共服务权益,要完善失地农民城镇安置区的交通基础设施条件,新建和优化周边各类学校、医院以及体育文化场馆等公共设施,为失地农民提供便利的教育环境、完善的医疗保障和便捷的文体活动场所,增强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和效率,以提升其城镇生活水平和发展质量。

参 考 文 献

- [1] 董金秋,贾俊民.城中村农民市民化演变效果的实证研究[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2(1):52-58.
- [2] 朱晒红.新城镇化背景下失地农民补偿安置问题——基于政府公共性缺失视角[J].农村经济,2014(2):80-84.
- [3] 吴业苗.城郊农民市民化的困境与应对:一个公共服务视角的研究[J].中国农村观察,2012(3):71-77,81.
- [4] 李永友,徐楠.个体特征、制度性因素与失地农民市民化——基于浙江省富阳等地调查数据的实证考察[J].管理世界,2011(1):62-70.
- [5] 冀县卿,钱忠好.失地农民城市适应性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苏省的调查数据[J].中国农村经济,2011(11):23-35.
- [6] 杨圆圆.失地农民市民化相关问题研究——基于发达地区的考察[J].农业技术经济,2011(11):24-33.
- [7] 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颐,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 [8] 林乐芬.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市民化现状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09(3):65-69.
- [9] 周兢.政策运行的向心力及其对失地农民市民化的影响[J].农村经济,2012(10):7-12.
- [10] 陈浩,葛亚赛.征地满意度、非农就业与失地农民市民化程度探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65-69.
- [11] SHITTU A M. Off-farm labour supply and production efficiency of farm household in rural Southwest Nigeria[J].Agricultural and food economics,2014(6):23-34.
- [12] 丁士军,杨晶.征地与农户收入结构变化:对九江和襄阳农户数据的分析[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1-8.

(责任编辑:陈万红)